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三卷

1966—1976

当代中国研究所 著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三卷
1966—1976

当代中国研究所 著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6)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导火索	(6)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6)
二、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8)
三、批判“彭罗陆杨”和“三家村”	(14)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6)
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16)
二、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把动乱推向社会	(18)
三、“炮打司令部”和改变中央领导结构	(21)
第三节 红卫兵运动与全面造反浪潮	(23)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23)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党政机关遭到全面冲击	(27)
第四节 在动乱中撑持	(31)
一、限制和抵制“左”倾错误危害的努力	(31)
二、维持工农业生产的基本运行	(34)
第二章 “一月夺权”导致全面内乱	(38)
第一节 “一月夺权”与“二月抗争”	(38)

一、上海“一月夺权”及其在全国的影响·····	(38)
二、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43)
第二节 全面内乱的失控局面·····	(48)
一、“三支两军”与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	(48)
二、“大批判”运动与大批冤假错案的产生·····	(51)
三、全面内乱下的局势失控·····	(54)
四、为控制局面采取的措施·····	(57)
第三节 经济建设遭受巨大破坏·····	(60)
第三章 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与中共九大的召开·····	(64)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学校、机关·····	(64)
一、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设想·····	(64)
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过程及其结构·····	(67)
三、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	(72)
第二节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召开·····	(73)
一、刘少奇冤案的形成及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73)
二、中共九大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77)
第三节 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推行·····	(81)
一、“斗、批、改”的提出和贯彻·····	(81)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88)
第四章 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91)
第一节 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进行的激烈斗争·····	(91)
一、修改宪法与庐山会议上的较量·····	(91)
二、“批陈整风”运动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政变阴谋·····	(96)
第二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01)
一、毛泽东视察南方和九一三事件·····	(101)
二、“批林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 怀疑抵制·····	(104)

第五章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在严重干扰中有所发展	(108)
第一节 “三五”计划的完成与“四五”计划的制定	(108)
一、经济缓慢复苏与“三五”计划的完成	(108)
二、“四五”计划的制定与两年经济调整	(110)
第二节 经济管理体制的大变动	(117)
第三节 规模空前的三线建设	(121)
一、三线建设在战备高潮中重新铺开	(121)
二、三线建设的成就与偏差	(124)
第四节 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	(128)
一、极左思潮对农村政策的冲击和“学大寨”运动	(128)
二、70年代前期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131)
三、社队工业的兴起	(133)
第五节 工业得到一定发展	(134)
一、石油、电子、煤炭工业的发展	(134)
二、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	(137)
第六节 国防科技与军队建设的发展	(138)
一、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138)
二、军队建设的发展	(142)
第七节 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145)
一、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	(145)
二、对外经济工作出现新局面	(148)
第六章 纠“左”与批“右”的曲折	(153)
第一节 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53)
一、毛泽东对部分错误的认识与纠正	(153)
二、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逐步恢复、落实政策的努力	(157)
三、深入批判极左思潮	(161)
第二节 坚持“左”倾方针的错误决策	(164)
一、纠“左”努力受挫	(164)

二、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	(167)
第七章 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	(171)
第一节 排除“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171)
一、“文化大革命”前期外交工作的一度混乱	(171)
二、恢复正常外交秩序与修复对外关系	(173)
第二节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176)
一、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176)
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与全国战备高潮	(177)
三、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179)
第三节 援越抗美	(182)
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扩大入侵越南的战争	(182)
二、在缓和对美关系中始终坚持援越抗美的立场	(185)
第四节 中美关系的突破及其影响	(188)
一、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	(188)
二、中日恢复邦交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	(197)
第五节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与 继续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201)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201)
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	(203)
三、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206)
四、联合反霸斗争的开展	(207)
第八章 从“批林批孔”到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210)
第一节 “批林批孔”运动引起再度动乱	(210)
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210)
二、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制造新的动乱	(214)
三、为控制动乱局面而作的努力	(219)
第二节 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图谋	(221)
一、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221)

二、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破产	(224)
第三节 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227)
一、毛泽东周恩来长沙会晤，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完成	(227)
二、四届全国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	(230)
三、肯定“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 1975 年宪法	(231)
四、恢复全国人大常委会机构，确立国务院领导核心	(233)
第九章 1975 年整顿和“四五”计划的完成	(236)
第一节 毛泽东三项指示的初步贯彻	(236)
一、为实现安定团结采取的一些措施	(236)
二、贯彻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238)
三、制定、下达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	(239)
第二节 邓小平主持 1975 年整顿	(241)
一、整顿从铁路抓起	(241)
二、煤炭、钢铁的整顿	(244)
三、围绕“反经验主义”问题的较量	(248)
四、军队整顿	(253)
五、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	(260)
六、围绕评《水浒》的较量	(267)
七、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面整顿的部署	(269)
第三节 “四五”计划的完成和长期规划的拟定	(273)
一、“四五”计划的完成	(273)
二、十年长远规划的拟定	(275)
第十章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279)
第一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279)
一、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引起形势逆转	(279)
二、从“教育革命大辩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281)
第二节 四五运动	(282)
一、沉痛哀悼周恩来	(282)

二、“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	(284)
三、天安门事件	(288)
第三节 粉碎“四人帮”	(291)
一、“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	(291)
二、唐山地震与抗震救灾	(294)
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与世长辞	(296)
四、粉碎“四人帮”前的紧张斗争	(298)
五、十月的胜利	(299)
结束语	(304)
大事年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312)

引 言

1966年至1976年期间，在中国发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了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中共党内一些老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为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第二阶段是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

装政变的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粉碎这次政变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势力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是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江青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并利用这一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反对周恩来、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它是毛泽东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走入误区的结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注意克服共产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特别重视吸取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等教训，力图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晚年对于社会和中共党内的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分析和估计，作出了许多不确切的以至错误的判断，而且所采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鼓吹个人崇拜，煽动无政府主

义，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在全国上下形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林彪一伙甚至图谋发动政变、叛乱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天下大乱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如毛泽东所预期的天下大治，而且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灾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日起，在中共党内，在人民中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种斗争的错综复杂、艰难曲折，为历史上所罕见。中共高层领导的多数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与斗争，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与斗争，为最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下了基础。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也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一些错误。他制止和纠正了一些具体的错误做法，而且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没有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即以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诚然，“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共和国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影响遍及全国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这十年间唯一的大事。这十年间还有经济建设取得进展和外交局面有重大突破等大事。在研究和叙述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如实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这个历史时期加以区别，没有把两者等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这十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貌。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很少改善，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拉大了差距。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的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尽力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后期又重申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宏图，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完成了“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十年间，粮食生产有所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石油、铁路、舰船工业，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作物育种，氢弹、导弹和卫星研制等，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且开始较大规模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能够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外交方面，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冲击带来了严重混乱，但从70年代起即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同许多国家修复了外交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美国、苏联两方面的压力，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取得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中日建交等重大突破，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边防，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执行了“三支两军”任务，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人民军队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坚强支柱。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干部和群众遭受巨大磨难，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改变，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没有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能够获得新的发展的基本前提。

根据以上观点，本卷力求既客观地叙述十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和它造成的严重灾难，科学地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又如实地写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在曲折起落中取得进展的历程，打开外交新局面的经过，抵御外敌，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如实地记录十年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获

得的规律性认识，以便以史为鉴，使我们能够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的严重错误，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懂得，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从而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开拓前进。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经过 1961 年至 1965 年的五年调整，经过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得到明显好转。这一年，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工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党内“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毛泽东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策，国家和社会陷入政治动荡之中。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导火索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大挫折，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背景，是 60 年代以来毛泽东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积累滋长并急剧发展的结果。

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种种问题的暴露，毛泽东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发展下去，这些干部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

产阶级打倒”。^①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推翻，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的估计，对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1964年2月，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②这反映了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心态。

1965年8月3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部长马尔罗访华。毛泽东在同马尔罗谈话时又强调说：“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③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心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3页。

库时回顾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

很明显，毛泽东把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特别是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归于阶级斗争。基于这种估计而得出的认识，作出的判断，乃至采取的方式、方法，都是错误的。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邓小平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②

二、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等情节与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断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剧作者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9—14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案”。显然，文章不仅仅是针对剧本与作者的一般批判，而且涉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存在的分歧。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明朝清官海瑞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告诉了吴晗，并请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和戏。6月16日，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9月21日，吴晗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此文经胡乔木修改，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反映庐山会议精神的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内容。其后，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吴晗写成新编历史京剧《海瑞》，于1961年初上演，剧名改为《海瑞罢官》。该剧颂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海瑞这样的清官在封建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从《海瑞罢官》的创作过程可见，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历史文化，突出表现的也是毛泽东当时提倡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1962年，在中央没有领导职务的江青，极力想在文化领域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江青先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没有接受。1964年9月，彭真、陆定一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情况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吴晗不要指名批评。但是，康生又向他提出，《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罢官有关，从而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江青在北京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①要他们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没有得到响应。1965年，江青到上海找到分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组织姚文元等撰写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和有关部门秘密进行的。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了，让江青拿回上海发表。1965年10月

^① 转引自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0页。